

老师青墨的任平生

梁秉堃 著

张和平 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师曹禺的后半生/梁秉堃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9

ISBN 978 - 7 - 5063 - 5542 - 1

I. ①老… II. ①梁… III. ①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6239 号

老师曹禺的后半生

作者: 梁秉堃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张晓光

扉页题字: 张和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30

字数: 200 千

印张: 14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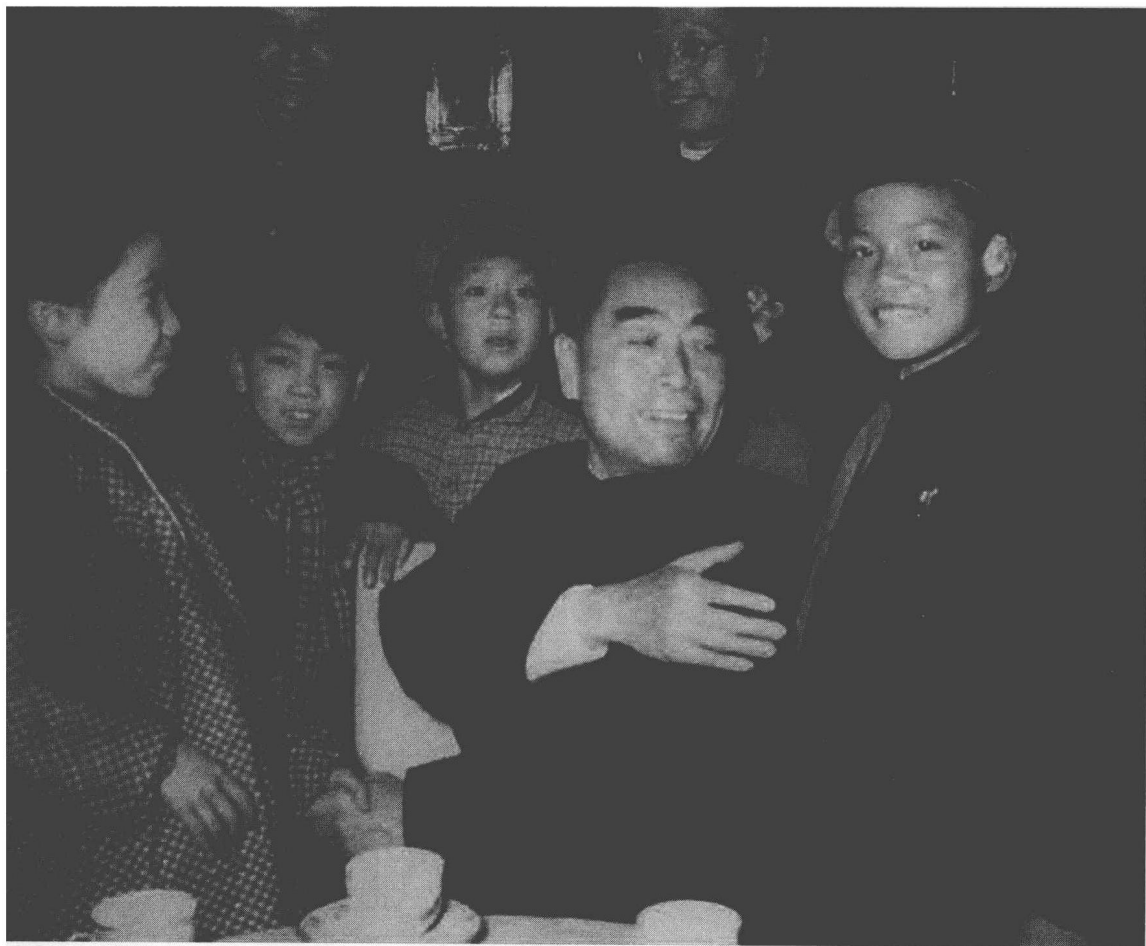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542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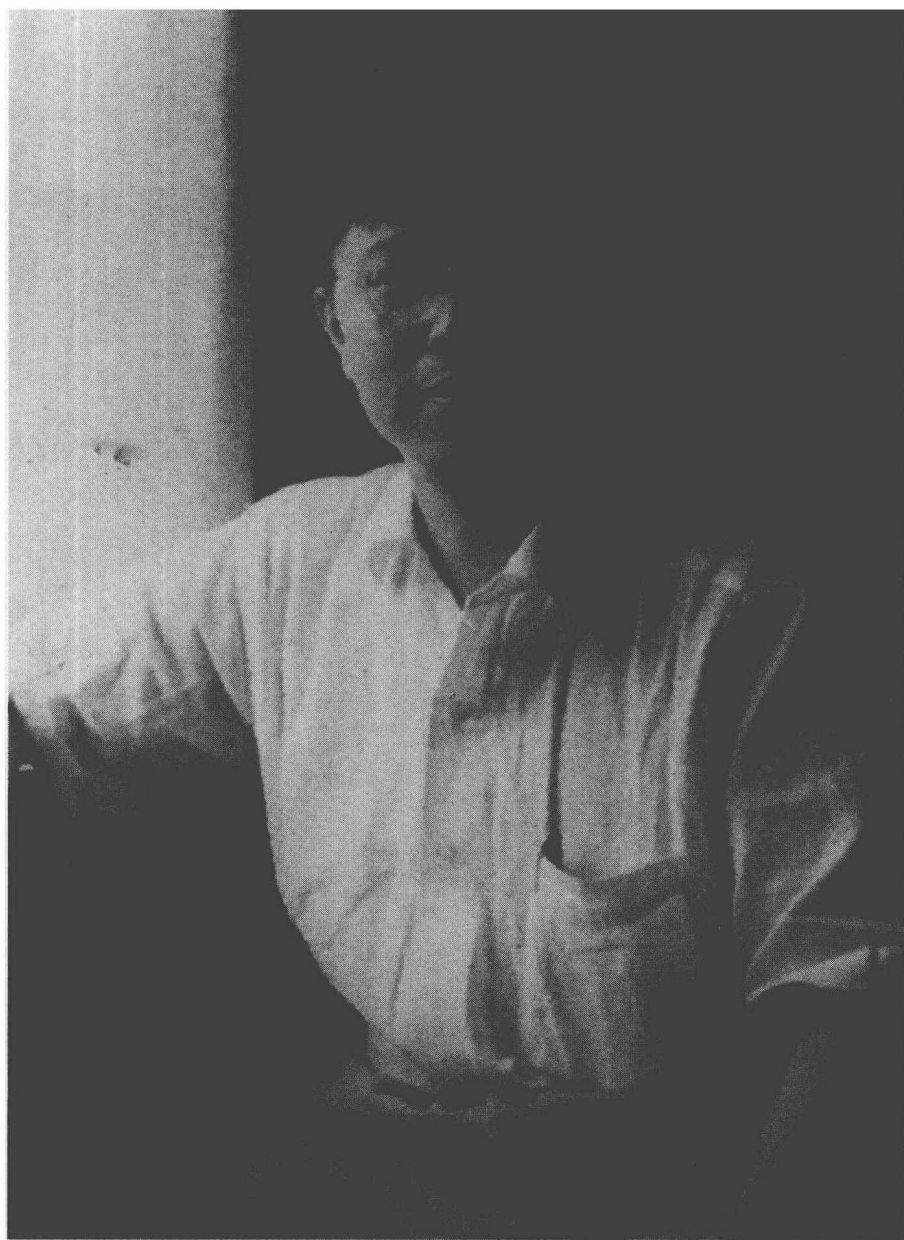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961年2月14日，曹禺（后右）陪同周恩来总理在
首都剧场三楼宴会厅出席北京人艺除夕联欢会。



年轻时的曹禺。



曹禺在首都剧场舞台上与《王昭君》演员们谈戏。



曹禺先生祝贺《哗变》在美国演出成功。

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是曹禺老师百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一直想写点什么。而且，特别想找一个新的角度，或者说是广大读者和观众更为关心、更为关注的角度。于是，就想到了解读老师的后半生。关于老师的后半生议论很多，有褒有贬，众说纷纭，我作为在老师身边工作、学习了42年的学生，有义务尽可能真实、公平，客观把他写出来。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曹禺老师始终处于内心复杂的矛盾之中。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此话不假。曹禺老师的创作状况，乃至生活状况、思想状况都是如此。而且，可以说，矛盾运动的双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因你有我，因我有你”的紧密关系，是互为依存，互为因果的。我想，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点才能把问题说清楚，也才能把问题说深刻。我就是本着这个理念来写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更深、更好、更新地了解、理解，乃至谅解中国这位不可多得的戏剧大师、戏剧诗人。哪怕是做到了一些，我也会感到满足、感谢和感激的。我想，曹禺老师如果在天有知，也一定会高兴和感动。

梁秉堃

2010年7月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献给我的爸爸（代序） / 1

第一章 “他真能走得安详吗？” / 1

第二章 不可或缺的历史交往 / 19

第三章 祖国啊，我回来了！ / 42

第四章 执笔试写新天地 / 63

第五章 北京人艺终身院长 / 76

第六章 祖国需要我的笔！ / 97

第七章 喜逢“小阳春” / 111

第八章 在漫漫的暗夜当中 / 129

第九章 从地狱里逃出去 / 144

第十章 明白了，也残废了 / 162

第十一章 寄希望于未来 / 180

后记 / 205

献给我的爸爸（代序）

万 方

我的爸爸是在夜里走的，他没有向我们告别，死亡悄无声息地把他的生命之火吹灭。我走在大街上，天很晴朗，街景和往日一模一样，但它有一点不一样，我再不能到医院里去看我的爸爸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爸爸的身体一点点地衰弱了。有时候我走到他面前，而他闭着眼睛并不知道。我注视他这时我能够感觉到在他脑海中浮游着的梦。那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梦，表现着他的一生，又真实又虚幻。他睁开眼睛看见了我，微笑了，和我说话，在所有这些活动的后面他的梦始终在那里静悄悄地聚散。我说不清，但我感觉得到它的力量。我渐渐明白，我的爸爸因为病重没有力气思想了，这样一种时断时续的记忆就成了他的思想。他坐着或躺在床上，看见了许许多多的事物、人的面容、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他无法把这些告诉我们。我想衰老的过程像一种过滤，将他不能负重的身心滤去废物，留下一些真的东西。

曾经，我爸爸是个思想不能停住一刻的人，就像被鞭子抽着的陀螺。在他没有生病住院之前，只要他一静下来，就会被思想不停地抽着。他想得很多，为自己不能再写出东西而痛苦，他剖析自己，用重重的话批判自己，但是他又拿自己没有办法。那时他的枕头边上常放着《托尔斯泰评传》之类的书，他看着看着会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他和我说：“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我想我知道。

生病以后，他一点点放弃了他的痛苦，放弃了由痛苦所代替的那种强烈的愿望。渐渐地，他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

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感动过我。”然而，这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月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

的宝贝都挖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巴老又写道：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以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时，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巴金老的夫人——引者注），他失去了方瑞（曹禺老师的第二任夫人——引者注），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样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间，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板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那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

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恢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巴老最后还写道：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来，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届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

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①

巴老不安地、痛楚地提出：“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他的朋友，留给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请反复读一读，这最后一句话的斤两，这一问问得有多么尖锐，多么沉重，又有多么深刻啊。那么，回答大约只能是一个：“不能！”想想看，曹禺老师确乎不能走得那样安详，不可能走得那样安详。也许，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矛盾而又复杂的原因，就包括在本书将要提到的一些难以回避的追思之中。

笔者以为，巴老的信写得很简约、很舒缓，但是也很含蓄、很厚实，甚至可以说，是很强烈、很炙热，表面上是平平常常的“字”，远远不及背后里浓浓重重的“意”要多。这一切仿佛如同“深深的水，静静地流”，逼迫着读者去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得很深。比如，一句短短的“我们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便会勾起大家多少的回忆和沉思啊？！

时间过得多么快，转眼之间曹禺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四个春夏秋冬了。是的，他的离开把痛苦留了下来，然而让我们除去痛苦的思念以外，还有更多的痛苦的思索，刻骨铭心的、无法逆转的思索。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纪念这位曾经被赞誉为“摄魂者”和“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戏剧诗人呢？难道就是说几句歌颂赞美的套话、空话和大话吗？或者是说几句照章办事说了等于不说、不关痛痒的、半真半假的虚话吗？……恐怕都不是的，都不应该是的。应该通过曹禺老师的个例现象，来全面地、认真地、深入地思索一下，在他们那一代作家、艺术家身上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沉重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寻找到历史原因——解释世界的本性，本来就是人类不可更改的愿望。也许，只有如此才能更有利于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正确、健康、持久地发展。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曹禺老师也一定会含笑于九泉，并带来些许欣慰，或许他的灵魂才真正能够得到安息。

笔者的这个想法并非是没有缘由的。近日，我有幸读到了曹禺老师1981年写下的全年日记，据其夫人李玉茹大姐说：“整整一年流水账式却详尽的日记，这在曹禺来说，也是难得的资料。”“通过它能看到曹禺几十年来，忙忙碌碌、实实在在地做了许许多多，他不擅长、不熟悉，而是竭尽全力去做的工作。”“曹禺是个闲不住、管不住自己的人，巴金先生说他‘好热闹’。确实，有许多事是他愿意做，喜欢参加的。做了这些事，他的内心，又充满了矛盾、痛苦、悔恨，等等等等。”“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异常敏锐，比任何人看得都透彻，甚至过火。大约他是艺术家、诗人，极易夸张、偏激。然而，他的勇气是惊人的，敢于剖析自己，我仿佛看见他用尖刀扎进自己的心窝，流着血。”^②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部难能可贵的日记，使我们可以比较深层次地走进曹禺老师的灵魂，探索一些原来模糊的、不可知的东西，从而对他的真实命运，主要是真实的后半生心路历程，有了进一步的、亲切的了解、理解和谅解。甚至，从这里可以得出我们并不愿意看到，又无法抗拒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重要结论。从一定意义上看，这部日记是曹禺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写到此处，我不由得想起了巴老在《怀念老舍同志》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富翁，他收藏许多古董珍品。后来他在事业上失败了，于是把收藏的古董一件件变卖，最后富翁终于落魄成为讨饭的乞丐。然而，即使成了乞丐，有一只宝贝的壶，他是怎么也不肯割爱的，他带着这只壶到处流浪。当时，另外有一个富翁知道了这件事，便千方百计要获得这只宝贝的壶。富翁出了很高的价钱想把壶买到手，虽经几次交涉，乞丐却坚决不肯脱手。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乞丐已经老态龙钟，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富翁便给乞丐房子住，给乞丐饭吃，暗中等待乞丐死去。没过多久，乞丐衰老以极，马上要病死了。富翁高兴极了，觉得盼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可是谁能想到，乞丐在咽气之前，硬是把这只宝贝的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身碎骨。”巴老坚定地认为，老舍是不会像乞丐那样死的，既不会抱着壶跳楼，也不会故意把壶摔碎，而一定是要把美好的珍品永远留在人间。我们对于这些话同样可以理解为，曹禺老师和老舍先生一样都会像巴老说的那样做

的，把美好的珍品永远留在人间。

难道曹禺老师真的把痛苦留给我们，自己不肯留下宝贝珍品而又走得那样安详吗？……那好，我们就从这条线索说开去吧！这里，我们不妨把思路再展得开阔一些，深远一些，首先粗略了解一下世界上一些著名作家在他们的后半生里，是怎样进行自己终身挚爱的文学创作的。目的只在于使我们增加一个思索问题的“参考系”。

狄更斯生于1812年，卒于1870年，享年58岁，而其代表作《大卫·科波菲尔》是写于1850年，时年38岁；

契诃夫生于1860年，卒于1904年，享年44岁，而其代表作《海鸥》是写于1896年，时年36岁；

但丁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享年56岁，而其代表作《神曲》是写于1300年至1321年，时年35岁至56岁；

卜伽丘生于1313年，卒于1375年，享年62岁，而其代表作《十日谈》是写于1350年，时年37岁；

席勒生于1759年，卒于1805年，享年46岁，而其代表作《阴谋与爱情》写于1782年，时年23岁；

歌德生于1749年，卒于1832年，享年83岁，而其代表作《浮士德》写于1808年（第一部）至1831年（第二部），时年59岁至81岁；

巴尔扎克生于1799年，卒于1850年，享年51岁，而其代表作《人间喜剧》中的《欧也妮·葛朗台》写于1833年，享年34岁，《高老头》写于1835年，时年36岁；

罗曼·罗兰生于1866年，卒于1944年，享年78岁，而其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于1912年，时年46岁；

海明威生于1899年，卒于1961年，享年62岁，而其代表作《老人与海》写于1951年，时年52岁；

雨果生于1802年，卒于1885年，享年83岁，而其代表作《九三年》写于1873年，时年71岁；

大仲马生于1802年，卒于1895年，享年93岁，而其代表作《基度山伯爵》写于1844年，时年42岁；

小仲马生于1824年，卒于1895年，享年71岁，而其代表

作《茶花女》写于1871年，时年47岁；

福楼拜生于1821年，卒于1880年，享年59岁，而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写于1857年，时年36岁；

莫泊桑生于1850年，卒于1893年，享年43岁，而其代表作《羊脂球》写于1880年，时年30岁；

杰克·伦敦生于1876年，卒于1916年，享年40岁，而其代表作《荒野的呼唤》写于1903年，时年27岁；

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享年52岁，而其代表作《哈姆雷特》写于1601年，时年37岁；

易卜生生于1828年，卒于1906年，享年78岁，而其代表作《玩偶之家》写于1879年，时年51岁；

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卒于1910年，享年82岁，而其代表作《复活》写于1899年，时年71岁。

.....

从上述的一部分统计数字来看，绝大多数世界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都是产生在其后半生或者接近后半生当中的。我想，这也许是有原因的，因为一定意义上说，后半生才是作家创作的“黄金时期”，因为其思想、生活和技巧都处于一种成熟状态、高峰状态，所以创作也就会出现一种“井喷”状态，正是如此才是比较自然的，可以理解的，比较正常的。

巴老在晚年曾经写信给曹禺老师，提出当年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这些话是很能触动人的。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曹禺老师最后住进北京医院长长的八年日子里，才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病房中，都是读着《托尔斯泰评传》的，并且常常看着看着突然把书推开，满怀激情地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呀，不知道我有多么惭愧！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啊！”……

接下来，我们实在是不能忍心地，又不得不面对地，再来认真看一看曹禺老师本人，一生实际创作的情形是怎样的：他在1933年，时年23岁，就写出了代表作《雷雨》，实在属于青年“早慧”，本应后半生里能作出更多、更大、更好的创作成绩来，然而，如众